

郁达夫小说性爱叙事的文学史价值重估

□ 韩 冷

摘要: 斯蒂纳、卢梭、戈蒂耶、王尔德、施笃姆和尼采这些关注人的感性生命的西方文学家都对郁达夫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影响。同时,郁达夫也受到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但他的情爱书写,缺失了将好色与物哀等日本传统审美理念相结合的审美特征。俄罗斯文学也对他的创作有影响,屠格涅夫塑造的多余人形象,曾经引起郁达夫的极大兴趣,然而,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不是消除男权的斗士,而是维护男性自尊的最后一根稻草。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于病态心理和变态人格的描绘也给了郁达夫以有力的影响。关于郁达夫作品的文学批评,一个观点值得商榷,现代社会不是不受限制的性自由时代,性仍然要尊重道德的界限、人伦的规范和法律的限制,而宗法制社会也不是一贯地否定性欢乐。颓废是西方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文化语汇,与中国的时代背景并不相同,所以郁达夫性叙事的革命性并不能成立,他的爱国主义情怀也来得比较牵强。

关键词: 文化背景;非性化;性压抑;颓废;爱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2)11-0105-07

一、郁达夫小说性爱叙事的文化背景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人的发现成为时代的潮流。郁达夫很欣赏西方世纪末张扬“自我”的哲学思潮。斯蒂纳作为尼采哲学的先驱,将自我强调到空前的高度,“自我就是一切,一切就是自我。”郁达夫则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立足自我、探求个体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郁达夫思想创作的一个突出特色。

郁达夫同时非常崇拜卢梭,“法国也许会灭亡,拉丁民族的文明,言语和世界,也许会同归于尽,可是卢梭的著作,直到了世界末日,创造者再

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止,才能放尽它的光辉。”卢梭和郁达夫都对个人的生活作了大胆的表现与一定程度上的暴露。《忏悔录》可以视为卢梭的自传,这是他在晚年对一生的回顾与总结,对所犯错误的暴露与忏悔。郁达夫则非常强调艺术创作的真实。卢梭的忏悔意识源于其自信自己比那些大人先生们要高尚得多,郁达夫则自信自己要比那些宗法社会的卫道士们高尚得多。卢梭毫无保留地坦白了他的性生活,他的性虐待、自慰爱好以及对华伦夫人的乱伦性爱。郁达夫的作品则以裸露直白的手法表现了主人公病态的性生活。这种描写对于中国几千年来的虚伪道德是一个大胆的反叛和挑战。

唯美主义文学源于法国,其首创者为法国人戈蒂耶,他在《〈阿贝杜斯〉序言》和《〈莫班小姐〉

作者简介:韩冷(1977-)女,辽宁鞍山人,广东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序言》中,第一次较为完整地解释了唯美主义,他强调:“只有毫无用处的东西才是最美的,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丑陋的。”他的这种思想又被英国作家王尔德所继承,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在欧洲文学的影响下,在本世纪初,作为反自然主义文学的一个流派,唯美主义文学在日本登陆了,当时著名的唯美主义作家当推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等人,郁达夫在日留学期间即与佐藤春夫相识。日本的唯美主义小说家除了轻视道德评判外,还把一切在通常意义看来丑陋不堪、肮脏变态、畸形乖戾的东西全纳入审美的范畴,试图把丑的事物通过艺术的加工让它开出一朵绚烂的恶之花。在20年代的前半期,郁达夫不仅翻译了王尔德的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而且还翻译了王尔德为这部小说所写的《自序》。1921年郁达夫的《沉沦》出版后引起了许多非难,郁达夫感到有必要表明自己的态度,而《自序》恰恰说出了他想要表达的意思。王尔德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虚伪道德、市侩风气和势利哲学的反叛者。他认为当时社会里极端的功利主义不仅造成了美的衰弱,而且扼杀了艺术的生机。因此,他打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大旗来矫正时风。王尔德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对正挣扎于沉沦中的郁达夫无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郁认为:“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但他并不一概地反对文学的宣传教育作用。

我国著名的德国文学翻译家杨武能先生曾断言:“施笃姆无疑是自五四以来最受喜爱、最富影响的外国作家之一。”^①郁达夫属于向中国读者介绍施笃姆的垦荒者之一。1921年他为郭沫若翻译的《茵梦湖》所写的那篇序言,可以说是国内最早出现的一篇关于施笃姆的专论,郁达夫对施的生平和创作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和评述。早在留学日本时期,他就阅读过许多研究和介绍他的专著,如施笃姆的好友Paul Schuetze所著的《施笃姆传》,F·Wehl所著的《施笃姆传》以及A·Biese所著的《施笃姆与现代写实主义》等。他还在1927年亲自翻译了施笃姆的小说《马尔戴和她的钟》。^②郁达夫与施笃姆的小说创作都具有自叙传色彩,作

品都散发着浓郁的感伤气息,主人公都是无力掌握自己命运的多余人。

郁达夫回国后还翻译了尼采的《超人的一面》,1923年,写了《自我狂者须的儿纳》,对施蒂纳的生平与哲学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他们的学说都强调个人意志与自我价值,否认偶像和权威,主张破坏一切传统,宣传个性独立、精神奋进,表现和扩张自我。^③郁达夫还曾翻译过歌德的《威廉·迈斯特》中的《迷娘曲》,他在小说《南迁》里还整段地引用过《迷娘曲》,郁达夫的小说在某些方面也深受《少年维特之烦恼》影响,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严重沾染了维特式的自伤自怜。^④以道森和大卫森为代表的“黄面志”作家群悲观厌世、放浪形骸的人生态度和忧郁苦闷、感伤颓废的创作情调也吸引了郁达夫。^⑤总之,郁达夫所接触的西方诗人、哲学家们,大都有着对人的感性生命关注的共同特点,它是近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大潮开出的花,结出的果。

私小说是日本近代小说的一种特殊形式,作者脱离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孤立地描写个人身边琐事和心理活动,直截了当地暴露灵与肉的冲突。日本的私小说源于自然主义小说,自然主义的第一个代表作家岛崎藤村,于1906年创作了《破戒》。使自然主义走向高峰的是由田山花袋于1907年发表的《棉被》。十几年后当这一创作类型逐渐走向成熟后,私小说这一概念被确定下来。郁达夫于1913年赴日本留学,此时正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鼎盛时期,也是日本的私小说逐渐繁盛的时期。郁达夫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更多地接受了日本私小说的影响。郁达夫对私小说的借鉴,主要表现在性苦闷的大胆暴露上。日本文学作品表达的是一种以性爱满足为最高人生价值、追求人生享乐的现世精神。这种精神在日本是作为人之常情和人的共性而从伦理上加以肯定的。郁达夫在日本的个人情感经历以及他对日本古典文学的广泛阅读,是他审美偏好倾向于日本文学好色审美传统的主要因素。可是日本作家小田岳夫却认为,即使是在日本明治、大正时代的小说中,也看不到如郁达夫那般露骨和果敢的

描写。^⑩郁达夫的情爱书写从总体意蕴上来看,缺失了日本好色文学中,将好色审美理念与物哀等日本传统审美理念相结合的审美特征。^⑪郁达夫的创作汲取了日本私小说以身边事为题材,艺术地再现自我的方法,具有强烈的自叙色彩。汲取了它不着眼于外部事件的描写,而重在刻画心境的方法,具有强烈的抒情格调。同时汲取了它不重情节的散文化结构的方法。^⑫

郁达夫在日记中曾说葛西善藏的小说“实在做得很好”。^⑬郁达夫和日本私小说作家葛西善藏所塑造的“零余者”软弱、不为社会所容、永远处于社会边缘,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欧洲文学中的“零余者”特点。不同的是欧洲文学中的“零余者”大都出身于贵族家庭,展示了欧洲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富裕阶层客观上的“多余”,精神上的空虚。而郁达夫和葛西善藏笔下的“零余者”则经济上困顿不堪。郁达夫与葛西善藏笔下的“零余者”不同之处在于,郁笔下的“零余者”胸中深藏着儒家济世传统的中国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⑭郁达夫小说中的弱者形象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嘲笑了男性英雄神话,逃避了男性的启蒙使命,但不能就此认为他与女性自然地形成了联盟,共同为消除男性的强权统治而斗争。对于这些零余者来说,对女性的强权可能是他们维护男性自尊的最后一根稻草。^⑮

在我们考察中国新文学的进程时,总会发现许多俄罗斯文学的渗透与滋养。早在1912年,郁达夫在东京读书时,就阅读了屠格涅夫的小说《初恋》和《春潮》。他发表了《屠格涅夫〈罗亭〉的问世以前》、《屠格涅夫的临终》等文章,翻译了屠格涅夫的著名论文《哈姆莱特和堂吉诃德》,向读者介绍了屠格涅夫的生平和思想。^⑯屠格涅夫曾经说:“我的自传,就在我的作品中。”^⑰与此相似,郁达夫也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⑱屠格涅夫塑造的多余人形象,曾经引起郁达夫的极大兴趣。郁达夫在《水明楼日记》中,谈到他自己将《多余人日记》读了三遍仍不觉厌倦,甚至感到“愈嚼愈有回味”。后来,他索性将它译成中文,以《零余者的日记》为题发表。^⑲于是,俄国文

学中的多余人,一变而成了中国文学中的零余者。^⑳多余人与零余者在各自的社会上找不到自我价值实现的方式,心理上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感伤。但多余人的感伤更多的来自于社会价值的失落,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哀,而零余者的感伤源自于男子养活家小的家庭角色与兼济天下的文人的社会角色的双重失落。屠格涅夫对自己主人公寄予了深切同情之外,还予以嘲讽与批判。而郁达夫则更多地认同自己的主人公,赋予零余者以更多的同情,这与郁达夫小说的主观叙事有关。^㉑屠格涅夫小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浓郁的抒情气氛和淡淡的感伤色彩。受其影响郁达夫的小说被认为是开创浪漫主义抒情小说的一代宗师。^㉒两位作家在心理描写方面截然不同,这与他们的创作原则及创作观念不无关系。屠格涅夫心理分析的原则是简练和明确,注重以暗示含蓄的方式揭示人物内心,强调通过动作表现人物内心活动,尤其是爱情心理活动描写绝妙地将人物内心的骚动、兴奋表现出来。而郁达夫作品的心理表现多数是人物直率的自我心迹坦露,内心独白成为心理描写的主要手段。^㉓

1920年在中国出现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中文译本,^㉔而他的长篇小说直到1926年才有中文译本。^㉕郁达夫对陀斯妥耶夫斯基表现出了不同于人生派作家的接受态度。他们都对人生的苦痛有着深切的体验,他们的作品都蒙上了一层灰冷的色调。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于病态心理和变态人格的描绘也给了郁达夫以有力的影响。^㉖

中国的狭邪小说盛行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以青楼梨园为主要表现空间,以士绅妓女为主要表现对象。^㉗郁达夫早期曾经阅读过《西湖佳话》和《花月痕》等明清小说。受其影响,郁达夫的小说也具有倡优士子模式,并且落魄才子与名妓之间具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感共鸣。在郁达夫的小说中存在着一个对女性“倡贞责淫”,而对男性则“一男数美”的性爱模式。^㉘郁达夫摆脱不了传统士大夫“名士风流”的心态,女性只是作为欲望的对象而存在,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尊严。^㉙郁达夫的名士气在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追

求个性、反抗权威的理想人格精神的同时,也表现出他们固有的软弱性、自卑性,缺乏西方浪漫主义英雄的那种坚定的人格力量。^③

二、郁达夫小说性爱叙事的文学史意义辨析

郁达夫既是男权社会伦理秩序的破坏者,又是父权制度的间接受益者。在书写女性时,他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了男权意识与男性立场。郁达夫赞美女神,同情女奴,厌恶女妖。女神只能成为郁达夫文本中欣赏的对象而无法成为欲望化对象。郁达夫对女奴的同情总是与叙事者超乎寻常的男性自恋相伴随。^④在对女奴的同情中,我们可以看到郁达夫在坦诚仗义背后的自我陶醉,看出一个高高在上的救赎者施舍赏玩的味道。^⑤厌恶女妖是宣扬“女人祸水论”这一男权观念的讽喻文本,源于其对女性以性能力为代表的强大生命力的嫉妒与恐惧。^⑥总之,郁达夫以男性叙事遮蔽了女性的声音。

郁达夫的思想中具有比较明显的非性化倾向,他笔下的男主人公受到妖妇型女性的吸引,却以忏悔和对这些女性的惩罚中否定了性爱存在的合理性,而天使型的女性作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神,又不允许身在凡世的男主人公有过多的非分之想。^⑦这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一个既承袭着传统文化伦理价值观念,又渴慕现代文明、现代生活方式以至于现代声色刺激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⑧在这里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现象,就是人们普遍把现代社会看做是一个性自由的时代,而将宗法制社会看做是一个性禁锢的时代,这个结论值得商榷。现代社会不是不受限制的性自由的时代,性仍然要尊重道德的界限、人伦的规范和法律的限制。而宗法制社会,人们也不是一贯地否定性欢乐,在中国传统的性观念中纵欲与节欲两种性道德观同时并存、交互作用。道家在肯定人欲的基础上走了两个极端:老庄从“全生适性”的目的出发,主张“故常无欲”、“不可见欲”(《老子》)的“无欲论”,杨朱则认为人生苦短,故应顺乎自然,主张任情极性的“纵欲论”;儒家承认人的自然欲求,又从建立性秩序出发,主张“节

欲论”。佛教最基本的戒律就是“五戒十善”,“五戒”和“十善”中都有戒淫邪的规定。而在七世纪传入西藏的佛教密宗,则提倡男女“双身”、“双修”,即通过性结合来修炼。上述种种既相矛盾,又相联系的性观念,几千年来一直贯穿于中国人的思辨活动和现实生活中。因此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性伦理的发展在文学中呈现出时而纵欲,时而禁欲的特点。但是做为主流的精英文化基本上是将性的功能等同于生殖,认为性享乐是可耻的。而在民间文化的原生态中存在着对性爱的毫无羞涩的向往倾向。^⑨

在郁达夫的44篇小说中,40篇小说有涉性描写的内容,大概有一半多的作品,以性苦闷为主要的表现内容。郁达夫在他的小说中,将性爱的痛苦、生存的痛苦作了淋漓尽致的宣泄,这些痛苦一重又一重地压在心头,使这些刚刚从爱的蒙昧中醒来的年轻人,不可能发出陶醉于爱情的欢歌,只能发出求爱而不得的凄楚呻吟。^⑩在郁达夫的小说中“性”是两性之间的全部内容,精神上的沟通和交流几乎不存在,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爱情,郁达夫把“性”当作丑陋的生命形态加以描写。应该说,与章衣萍等海派作家相比郁达夫笔下的性叙事还是比较含蓄的,甚至有一种宗教气味溢出来。性爱描写在其作品中只是作者感受世界和人生的一种特有方式。^⑪

在郁达夫的《秋柳》、《茫茫夜》和《她是一个弱女子》中都有同性恋内容的描写。以往的医学把同性恋列为一种变态性行为,然而最新的性科学研究表明,一部分先天同性恋是有生物学基础的,美国神经科学家利维在权威刊物《科学》发表论文说同性恋者的下丘脑在结构上与异性恋者有明显的区别。^⑫另外,母亲在怀孕期间如果遭受了压力,如亲人死亡、爆炸、强暴、严重的焦虑等,或者服用某些药物,也都会导致婴孩体内荷尔蒙分泌量的改变,使孩子有同性恋的倾向。^⑬这些最新的科学成果触发我们对同性恋者给予更多的宽容和理解,一些国家已经允许同性结婚,我国新颁布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和诊断标准》也不再将同性恋列为性变态。这对全社会进一步转变

对“酷儿”(包括同性恋、双性恋、跨性者和变性者)的态度,实现不问性象的社会平等,是有积极的意义的。在郁达夫的小说中,男性之间的同性恋被认为是最美的,是纯一的爱情。而指向女性的欲望则被视为兽性。^④在郁达夫的小说《沉沦》中有自慰行为的描写。在20世纪初,首先出来否认自慰可以引起精神病旧说的是法国医学家夏科。关于自慰行为,最有权威的研究还是当代的玛斯特斯和约翰逊博士用先进仪器所进行的研究。最终得出结论,自慰既不是不正常的,也不是对身体有害的行为。《沉沦》中还有偷窥行为的描写,其实偷窥是人的一种潜在的欲望,并不是性变态行为。

《茫茫夜》中有用针刺的方法来获得性欲满足的自虐性的性变态作法的描写。《过去》中有受虐狂的性变态描写。《雪夜》、《沉沦》、《南迁》、《茫茫夜》和《秋柳》中有消费性工作者的不道德行为的描写。有研究者认为,郁达夫烟花世界的书写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它是对旧道德所作的一种自觉的挑衅。^⑤郁达夫小说中的性变态行为和不道德行为的描写是与那个畸形的病态社会所发出的控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这种控诉更为沉重,给读者造成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⑥

五四新文学以反对宗法制的传统礼教为己任,争取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婚恋题材大量涌现。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郁达夫的性爱叙事。有人认为,郁达夫把五四的个性解放达到了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度。^⑦但是郁达夫的性爱叙事能否裹挟进这样的宏大叙事中则是需要商榷的。从今天看来,将书中男主角的性压抑归结为宗法制的压抑太过牵强了,小说中并没有关于男主角的个性解放的要求与宗法制家庭之间的冲突的大量铺排,男主角的压抑更多地表现为青春期的性压抑,男主角并没有寻找正常的渠道,比如结婚或者交女朋友来纾解这种压抑,而是通过消费性工作者来获得身体的释放和精神上的满足。在消费性工作者的过程中,男主角也表现出了超出常人的需求,他故意寻找那些丑陋和愚钝的性工作者,他在这种以上示下

的性交易中不仅获得了性的快感,而且获得了丧失已久的尊严。有研究者认为他的这种行为体现了平等的人道主义情怀,^⑧而我认为这恰恰是不平等的体现。男主角的施舍不是通过慈善的方式实现的,而是通过性交易的方式实现的,这完全体现了男主角自卑的心理。一种虚拟的强者话语,靠弱化对象来强化自我。郁达夫笔下的男主角一方面强烈地发泄着性的苦闷,采取种种方式来解脱,甚至对流连勾栏的猥亵生活有点津津乐道,但另一方面,又处处抱着道德的牌子,力求从现实的欲海中挣扎出来。^⑨对此有罪恶感和忏悔感。与此不同,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中也到处漫溢着性压抑,但是作家对性并没有罪恶感,他只有对性的满足感,对女性也没有歧视,而是充满感恩的情绪。

西方唯美主义将病态作为审美对象。有人认为是:“郁达夫的颓废是表达他的革命情绪的一种形式,在他身上,颓废与革命是一体的。”^⑩其实,颓废是西方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文化语汇,与中国当时的时代背景并不相同,所以他的革命性并不能成立。这种颓废的情绪在任何时代下都不能鼓舞人革命,况且他的这种颓废情绪的最后指向是消费性工作者,而不是与宗法父权制社会反目,所以他的行为只能获得零余者的共鸣。这种移植来的西方社会的现代性体验并不适合中国的土壤,也不是中国社会中产生的现代性体验。“郁达夫由于性欲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希望富国民强的意识,是一种人本位的心理欲求,而非一些研究者所说的是爱国主义的。因为他对日本的态度也是复杂的,一面憎恨军国主义,一面对日本风俗有无边的崇拜。”^⑪

有的研究者认为,郁达夫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几个历史阶段,郁达夫的小说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人对黑暗现实十分厌恶,对前途感到茫然的痛苦情绪。^⑫笔者以为,研究者的逻辑非常令人怀疑,面对时代苦闷的是“大我”,“大我”应该召唤个体为改变黑暗时代作出自己的贡献,就像李大钊、毛泽东那些革命先驱

一样,而“小我”则会时刻为自己的个人欲望不得满足而悲伤,郁达夫小说中,始终出现的是“小我”,“大我”几乎没有出现,“小我”的焦虑始终集中在性压抑上,根本不能想像男主人公将“大我”的焦虑通过“小我”来实现,这不符合文本的现实更不符合人物的内在逻辑。所谓那些将郁达夫小说中“小我”的焦虑最终解释为“大我”焦虑的反映的观点完全站不住脚,都属于研究者的过度阐释。况且即使在当下,“小我”仍然会面临那些压抑,这与时代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与其说抒情主人公报国无门方才于情欲中寻找麻醉,不如说他是在情欲苦闷中才深切感受到弱国子民的屈辱。所以他的爱国主义情怀来得比较牵强。如果性爱不是文章表现的重点,那么它就完全没有必要占有那么大的篇幅,甚至完全可以删去。关键郁达夫就是喜欢表现这些内容,这是他表现的重点,而控诉时代的黑暗不是重点。郁达夫的革命思想和他的革命行为与他的文学创作是否表现出革命性是没有必然的联系。《沉沦》后,郁达夫的创作经历了由个人到社会,由狂放到节制的过程。标志郁达夫创作风格转变的是《春风沉醉的晚上》(1923年)、《薄奠》(1924年)。作者开始把视线从自我内心的情感天地移向较为广阔的社会。他在1935年创作的两篇小说《唯命论者》、《出奔》已经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的倾向了。^{⑤⑥}

在郁达夫的创作中,值得肯定的是,确实在父权制的宗法社会,人的性本能处于被压抑状态,人的本性遭受严重摧残,需要摧枯拉朽的革命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背景下,郁达夫的创作冲破了扼杀人们个性和精神的宗法制道德的囹圄,而且也挑开了旧礼教的遮羞布。^⑤但是郁达夫的文本会使人误会,现代民族国家就是一个个人的性欲完全满足的社会。反观人类社会已经走过的漫长的时间历程来看,西方社会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人们可以自由恋爱,但是人们的欲望永远不能完全自由实现,文明社会总是会有压抑存在的,人们的欲望实现要关照社会伦理和道德的框范,要考虑法律和疾病的因素。所以认为革命就是解放爱欲本能是一种非常肤浅的看法。

注释:

耿传明:《郁达夫:“卢梭主义”与现代感性“自我”的镜像》,《烟台大学学报》2010年2期。

郁达夫:《卢梭传》,郁达夫文集(第六卷),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1页。

朱宏伟:《开发自然的美——郁达夫、卢梭文学观比较》,《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李嘉懿:《自然人性的回归——论卢梭〈忏悔录〉对郁达夫〈沉沦〉的影响》,《法国研究》,2007年4期。

赵澧、徐京安:《唯美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4页。

郭勇:《郁达夫与日本“私小说”及“唯美主义”文学》,《宁波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郭勇:《郁达夫与日本“私小说”及“唯美主义”文学》,《宁波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英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85页。

卢玉:《郁达夫与王尔德》,《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3期。

郁达夫:《艺术与国家》,《郁达夫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57页。

①杨武能:《德国的诗意现实主义与施笃姆的诗意小说》,《杨武能译文集》,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5页。

②刘久明、龙泉明:《郁达夫与施笃姆》,《江汉论坛》,2002年8期。

③刘久明:《郁达夫与德国文学》,《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2年4期。

④夏至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九龙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

⑤刘久明:《一群“薄命的天才”——论英国“黄面志”作家群及其对郁达夫创作的影响》,《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4期。

⑥[日]稻叶昭二、小田岳夫:《郁达夫传记两种》,李平、阎振宇翻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35页。

⑦肖百容、蒙雨:《郁达夫的情爱书写与日本文学好色审美传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2期。

⑧顾国柱:《论郁达夫与日本“私小说”》,《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6期。

⑨杜庆华:《接受与扬弃——论郁达夫的〈沉沦〉与日本私小说》,《邵阳学院学报》2002年4期。

⑩倪祥妍、方汉文:《跨文化视域中的“零余者”——郁达夫和葛西善藏比较研究》,《学术界》2010年10期。

⑪徐仲佳:《他者及其性政治叙事策略——论郁达夫

的女性书写》，《文学评论》2009年5期。

②王建维：《沉郁的感伤——试论屠格涅夫对郁达夫创作的影响》，《南通师专学报》1999年1期。

③罗岭：《屠格涅夫的现实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④郁达夫：《郁达夫文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28年，第335页。

⑤郁达夫：《达夫日记集》，长歌出版社，1976年，第259页。

⑥刘久明：《郁达夫与屠格涅夫》，《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4期。

⑦万信琼、李艳芳：《试比较郁达夫与屠格涅夫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4年1期。

⑧刘久明：《郁达夫与俄国文学》，《南开学报》2003年4期。

⑨邝姗：《郁达夫与屠格涅夫小说创作中心理描写方法之比较》，《名作欣赏》2007年5期。

⑩陈建华：《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88年，第69页。

⑪刘久明：《郁达夫与俄国文学》，《南开学报》，2003年4期，第99页。

⑫刘久明：《郁达夫与俄国文学》，《南开学报》2003年4期。

⑬吴萍萍：《近代狭邪小说影响下的郁达夫小说中的两性格局》，《北方文学》2011年3期。

⑭隋爱国：《传统的投影现代的写生——试谈郁达夫小说与明清性爱小说的性别意识》，《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1期。

⑮唐克龙：《性别观念与启蒙主义——郁达夫〈她是一个弱女子〉细读》，《语文学刊》2004年5期。

⑯孙宜学：《郁达夫：在沉沦中悲鸣的现代名士》，北京：《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1期，第53页。

⑰徐仲佳：《他者及其性政治叙事策略——论郁达夫的女性书写》，《文学评论》2009年5期。

⑱张晓霞：《郁达夫的男权意识与文学创作》，《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1期。

⑲徐仲佳：《他者及其性政治叙事策略——论郁达夫的女性书写》，《文学评论》2009年5期。

⑳赵艳花：《郁达夫小说中类型化女性形象的符号意

义》，《郑州大学学报》2010年4期。

㉑解志熙：《和而不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4页。

㉒韩冷：《京派小说民间狂欢的隐形书写》，《泰山学院学报》2011年1期。

㉓庄文泉：《性爱叙事的伦理诉求差异——劳伦斯与郁达夫性爱主题小说比较》，《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4期。

㉔周欣：《郁达夫小说中的性爱描写再认识》，《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年1期，第56页。

㉕阮芳赋：《性的报告》，中国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6页。

㉖英安妮·莫伊尔，戴维·杰塞尔：《脑内乾坤》，梁豪，邵正芳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18~127页。

㉗徐仲佳：《他者及其性政治叙事策略——论郁达夫的女性书写》，《文学评论》2009年5期。

㉘戴良山：《迷离世界中的精神慰藉——论郁达夫的“狭邪”小说》，《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23期。

㉙董易：《郁达夫小说创作初探》，陈子善，王自立：《郁达夫研究资料》，花城出版社，1985年。

㉚张法：《解读郁达夫小说》，《江汉论坛》，1999年9期。

㉛刘茂海：《郁达夫小说性爱主题的人文意义》，《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3期。

㉜周欣：《郁达夫小说中的性爱描写再认识》，《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年1期。

㉝罗滋池：《颓废与革命——试论郁达夫“不端方的文学”》，《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9期。

㉞王兆胜：《从创作动因看郁达夫〈沉沦〉的思想意义》，《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1期。

㉟刘茂海：《郁达夫小说性爱主题的人文意义》，《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3期。张恩和：《郁达夫小说漫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3期。

㊱王娟：《郁达夫的创作转变探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2期。

㊲温儒敏：《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2期。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院《广东社会科学》编辑部，广东广州510610）

（责任编辑：陈建宁）